

一个典型的伦理悲剧：

丧子情节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A Typical Ethical Tragedy: 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Choice in the Bereavement Plot

张必春 (Zhang Bichun) 刘敏华 (Liu Minhua)

内容摘要：作为一个典型的伦理悲剧，文学文本中的丧子情节不仅是一个有力推动故事发展、形成矛盾冲突的叙事情节，更是一个蕴含人物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的伦理事件。丧子事件不仅使丧子者长期陷入无法逃离的伦理环境，而且使其面临夫妻关系伦理和血脉祭祀伦理等无法跨越的伦理困境。在丧子之思的伦理焦虑中，夫妻双方的伦理选择蕴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彼此冲突的斯芬克斯因子。丧子夫妻之间聚合离散等多种形式的伦理选择，改变并重塑夫妻双方的伦理身份。因此，丧子情节映照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问题，兼具文本叙事、伦理探讨和思想分析等多重功能。

关键词：丧子情节；伦理困境；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

作者简介：张必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失独问题研究；刘敏华，武汉体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为2018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8YJC840052】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Choice in the Bereavement Plot as a Typical Ethical Tragedy

Abstract: As a typical ethical tragedy, the bereavement plot in the literary text is not only a narrative plot that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and form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ut also an ethical event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choice. The bereavement of children not only makes the bereaved fall into an ethical environment that they can't escape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makes them face insurmountable ethical dilemmas such as husband wife relationship ethics and blood sacrifice ethics. In the ethical anxiety of losing children, the ethical choice of husband and wife contains the Sphinx factor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factor and animal factor. Various forms of ethical choices between bereaved couples change and reshape the ethical identity of both

husband and wife. Therefore, the bereavement plot reflects the widespread ethical dilemma and ethical choice in human society, and has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text narration, ethical discussion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Keywords: the bereavement plot;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choic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Zhang Bichu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 problem of Shidu (Email: bczhang001@163.com).

Liu Minhua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285139692@qq.com).

在充满不确定性、脆弱性和风险性的现代社会中，受家庭结构、社会关系和伦理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丧子事件不仅仅直接意味父母血脉和家族传承的猝然中止，也深刻影响丧子父母的夫妻情感关系和家庭伦理结构。就此而论，丧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结构、情感性因素和文化性特质的伦理问题，其中蕴涵着伦理困境的产生、伦理身份的转换、伦理选择的发生、伦理认同的重构。作为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关系中，对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剖析伦理选择的过程，揭示不同选择给我们带来的道德启示，发现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训”（聂珍钊 5-6），其中伦理选择、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是三个重要维度。在文学文本的丧子情节中，丧子者常常会面临伦理环境和伦理身份剧变带来的强烈困惑，既会受到伦理语境、伦理困境和伦理焦虑的潜在折磨，也会在夫妻关系和血脉传承伦理之间发生摇摆。

一、丧子之痛与伦理环境的内在制约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概念体系中，“伦理的核心关注点是在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的公认的伦理关系。此外，它还涉及从伦理关系和各种伦理规范中衍生出来的道德秩序”（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0）¹。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聂珍钊 256）。丧子情节作为伦理事件发生之后，丧子父母往往会在情感和行为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面临多

¹ 凡未特殊注明，均出自笔者拙译。

重伦理环境的挤压拷问，产生强烈的伦理焦虑和身份迷失。换言之，丧子之痛带来的伦理变化，会对丧子者产生内在的精神制约；其中，文化伦理环境和时代伦理环境最为重要。

其一，丧子者无法逃离具体的文化伦理环境。尽管有着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内在区别，中外主流文化传统大多注重个体或群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规范和理念；其中，东方文化大多强调血脉传承是家庭的第一要义，重视生育孩子传承家族。“婚姻的意义就在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形的三边，不能短缺的”（费孝通 159）。孩子去世或子女夭折，不仅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影响家庭稳定，而且会导致家族血脉中断，丧子者成为家族罪人。当丧子者的遭遇与所认同的伦理环境相悖时，这种文化伦理会内在制约丧子父母，成为其心头的沉重枷锁。注重家族和关注人伦的伦理环境，在文学文本中得到比较生动的再现与改写。班纳特太太只有五个女儿，根据彼时法律家族财产只能由男性继承，班纳特太太便寄希望于将女儿们嫁给有钱的单身汉。她认可给家庭带来耻辱却嫁给有钱人的琳达，显示了班纳特太太的伦理选择：在道德标准和继承伦理中选择继承伦理。¹由于心爱的幼子夭折，布鲁姆在精神上受到无法弥补的创伤，妻子不忠使他再生子女的愿望落空。因此，布卢姆寻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他需要一个后代来巩固自己的身份和延续家族。²女儿意外去世后，瑞德和斯嘉丽在一起的唯一原因和纽带也消失了，瑞德最终厌倦斯嘉丽的“感情游戏”，对失去孩子的家庭生活也再无留恋，独自回到故乡寻找宁静的生活。³卜绣文不惜通过再生育孩子并牺牲其性命来挽救患渐进性贫血症独女的生命，但遭到丈夫的极力反对。在根本上，卜绣文及丈夫有着同样的家庭伦理观：子女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是他们生命意义的延续。⁴许三观先后十二次卖血，其中七次为一乐，一次为二乐，一次为全家。在许三观的认知中，家庭稳定、子女平安是最为重要的伦理纲常，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⁵对于父母而言，孩子不仅是连结夫妻情感的纽带，也是家庭未来的希望、血脉和文化的传承。

其二，丧子者无法逃离特定的时代伦理环境。这是丧子者在特定的时代内塑型的特殊伦理观念，因为丧子者普遍年龄较大，根据其出生时代塑造的家庭伦理观念有以下特征：首先，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核心家庭成为最普遍的家庭形态，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的趋势；其次，大多数人保有传统的家庭观和婚育观，拥有生育孩子的强烈意愿，希望孩子传承自身血脉。然而，

1 参见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2-24。

2 参见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金隍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34。

3 参见 玛格丽特·米切尔：《飘》，黄健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996-1000。

4 参见 毕淑敏：《血玲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7-29。

5 参见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06。

孩子去世后，固定的成长环境和思维模式导致他们难以改变对拥有孩子的渴望。由此，他们可能会丧失生活的激情与动力，独立面对时代塑造出的伦理环境给自己带来的困惑与苦痛。以《活着》为代表的文学文本的叙事重心和伦理意义，不仅是生动讲述中国普通人所承受和经历的世纪苦难，也是集中呈现中国底层民众的道德意识和伦理价值观，更反映了时代的伦理环境，形象折射出中国老百姓朴素的伦理认知和坚韧的伦理选择。福贵与妻子家珍本有一对儿女，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然而，因血型与县长夫人相同，儿子有庆为救人因抽血过多而不幸死去。闻听儿子死去，心情焦虑的福贵“一下子就看不见医生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余华 126）；得知儿子已下葬，骨瘦如柴的家珍“扑在了有庆坟上，眼泪哗哗地流，两只手在坟上像是要摸有庆”（余华 133）。儿子不仅仅是福贵与家珍之间伦理身份和伦理情感的重要纽带，更是人生希望和生活期待的情感寄托。儿子意外夭折后，聋哑女儿凤霞成为福贵的独子，不幸的是，女儿婚后因生产流血过多而意外死去，留下苦命的外孙苦根。“凤霞生下了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余华 172）。女儿的离去，彻底摧毁了二人对儿女基于血缘的伦理身份，也终结了二人对儿女朴素的牵挂操心，一如家珍所言：“凤霞、有庆都死在我前头，我心也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怎么说我也是做娘的女人，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余华 176）。在女儿凤霞去世三个月后，家珍也随之而亡，留下孙子苦根与福贵相依为命。谁知苦根因吃豆子过多撑死，福贵孑然一身，面对苦难重重的生活。

简言之，文学文本中丧子情节的发生，有力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使丧子者面临无法逃离的伦理环境，其中既有文化伦理环境的制约，又有时代伦理环境的型塑。丧子者会通过多种方式试图逃离以往的生活环境，但外在环境的改变显然无法弥合心中的伤痕。他们难以逃离的是被文化和时代内化于心的伦理环境。置身于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伦理环境中，丧子者往往面临伴随丧子之问带来的难以跨越的伦理困境。

二、丧子之问与伦理困境的深层拷问

在文学文本中，子女死亡作为一个推进文本叙事、牵动伦理关系的伦理事件，直接把丧子者逼入难以跨越的伦理环境，使其面临来自夫妻关系与血脉传承的伦理拷问。二者常常彼此对立，难以协调，形成比较典型的伦理困境或伦理悖论。

其一，丧子事件使丧子者面临无法逃避的血脉传承的伦理困境。一般说来，生儿育女既延续家族血脉传承，又佐证家庭伦理品德。正因如此，子女死亡使得丧子者大多面临着家族血脉伦理和夫妻关系伦理的双重拷问。父权制社会伦理普遍重视父系血缘传承，关注家庭的完整和家族的繁衍。子女死亡，既关乎个人身份和夫妻关系，更关涉家族血脉传承；在东亚传统伦理文化中，子女夭

折短期消解的是丧子者的父母伦理身份和夫妻伦理关系，长期消解的是家族血脉传承伦理。对丧子父母而言，走出丧子之痛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再生育子女。由于普遍年龄较大、男女生理结构差异，丧子父母常常面临彼此冲突、二中选一的伦理困境：要么牺牲血脉祭祀伦理，选择夫妻关系伦理，陪着伴侣终老一生；要么牺牲夫妻关系伦理，选择血脉祭祀伦理，另择配偶进行补救性生育。文学文本以形象的叙事和具体的场景，悄然呈现出丧子者两难的伦理困境与面临的巨大痛苦。在《祝福》中，相对丈夫遽然死去，痛失独子对祥林嫂的打击更强。它不仅在伦理关系上让母亲身份随之消失，也让她身体上备受打击形容枯槁面无血色，更在心理层面上让她饱受创伤精神错乱，成为闲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¹ 在丧夫和丧子的双重精神打击下，祥林嫂面临着难以跨越的伦理困境：是再嫁他人再生子女，还是孑然一身孤寡终生？是融入宗族放弃自我，还是麻木不仁放逐自己？如何以社会认同的伦理身份融入父权制家族中，融入以家族血脉为纽带的血脉祭祀伦理中，这应该是摆在祥林嫂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在父权制、宗族势力和封建思想的多重压迫下，祥林嫂孤身一人，走投无路，只能离开夫家，靠打短工勉强糊口。丧子之痛让祥林嫂离开夫家，失去家族保护，这也等同于放弃血脉祭祀伦理。丧子之痛还让祥林嫂身心遭受沉重的双重打击，不仅直接导致她在日常工作中精神恍惚，记忆衰退，而且在众人眼中变得伤风败俗，祭祀时的伦理身份被彻底改变。“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得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地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暗暗地告诫四婶说，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粘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鲁迅 16）。面对众人的同情和戏谑、嘲讽和指摘，祥林嫂被剥离了曾经的社会身份和伦理身份，只能以沉默来回应一切，沉浸在悲伤麻木之中。由此，祥林嫂被彻底剥夺伦理身份，只能通过“捐门槛”获得片刻的心理慰藉，这一事实表明伦理身份的改变给丧子者带来的巨大伦理困境。

其二，丧子事件使丧子者面临岌岌可危的夫妻关系伦理困境。在面对夫妻关系伦理压力时，部分丧子者（主要是女性）会通过纵容丈夫出轨来保持婚姻的完整性，在维系夫妻关系伦理时弃绝了血脉祭祀伦理。文学作品也有相类似的情节。尽管黛西对盖茨比颇为爱慕并与其有越轨行为，尽管汤姆背叛黛西在外边情人不断，但最后黛西和汤姆的婚姻还是得以维系下去。² 由于布卢姆性功能衰退，妻子莫莉不甘寂寞常常招蜂引蝶，这一切均使布卢姆蒙受着难言羞辱和精神折磨。但是，布鲁姆依然选择维持原有的夫妻关系，通过原谅妻子

1 参见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7-18。

2 参见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董继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7、137、187。

的不忠行为，维系其夫妻关系伦理。¹对于夫妻二人而言，无论遇到何种困境，轻易放弃夫妻关系是一种不负责任和有违伦理的行为，即使以颠覆另一种伦理关系为代价也要尽量保证夫妻关系的稳定。当面临血脉传承伦理压力时，部分丧子者会做出权宜之变，以延续血脉传承伦理。对于父权制社会而言，子嗣存续意味血脉传承，血脉继嗣涉及家族延续；较之女性，男性往往会对血脉祭祀伦理有更大的传承责任。处于伦理困境中的男性丧子者，大多会通过出轨和离婚两种途径寻求突破。出轨主要指丧子者保留原有的婚姻形式，但同时与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生育私生子。就道德伦理而言，出轨显然是对夫妻关系伦理的强力背叛，私生子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挑战。在文学文本中，二者均可视为对夫妻关系和家庭伦理等命题的叙事探讨。得知安娜与沃隆斯基偷情，卡列宁试图通过宗教、伦理和舆论约束安娜的出轨行为。²得知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亚瑟·博尔顿坚持的信仰和伦理纲常被摧毁，选择出走南美洲、流亡十三年，而蒙太尼里神父渴望父子亲情却无法得到，多年来内心一直备受煎熬。³每个人都在为伦理的颠覆付出代价。离婚主要指丧子者结束夫妻关系，男性再次组建家庭并生育子女。对于丧子者而言，子女死亡，夫妻双方失去联系纽带，此时夫妻二人如同断线的风筝，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很难再到一起。各有家庭的九木与凜子相恋，其违背夫妻伦理的行为被察觉后，九木的妻子催促其在离婚书上签字，试图通过离婚结束夫妻关系；但凜子的丈夫通过不离婚惩罚凜子，不让她再找配偶。⁴杜洛瓦因为想要追求更年轻漂亮的苏珊而通过一场捉奸闹剧逼迫玛德莱娜与他离婚，夫妻双方的行为都颠覆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离婚也是必然的伦理选择。⁵

在丧子情节中，由于丧子者身份剧变而导致的伦理混乱，给丧子者带来难以解决的伦理矛盾与伦理冲突，形成普遍存在于文学文本中的伦理困境。若选择捍卫血脉祭祀伦理，就会违背夫妻关系伦理；若选择坚守夫妻关系伦理，就会违背血脉祭祀伦理。在两种伦理关系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并非覆手易事，这主要涉及伦理选择中的三个阶段与斯芬克斯因子。

三、丧子之思与伦理选择的三个阶段

面对充满苦闷和焦虑的伦理困境中，丧子者经过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冲突融合，会根据不同的身份认知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从而“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

1 参见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金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96—104。

2 参见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887—890。

3 参见 艾·丽·伏尼契：《牛虻》，李俊民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74—90。

4 参见 渡边淳一：《失乐园》，林少华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年）215—217。

5 参见 莫泊桑：《漂亮朋友》，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284—295。

确认”（聂珍钊 263）。这种伦理选择既会符合某一时期的道德准则，也会违背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更会善恶并存难以简单论断。其中，斯芬克斯因子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此消彼长，是伦理选择是否合乎道德的内在成因；而“人性因子是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进行生物选择，由人类头脑所体现的伦理意识；兽性因子是指人在原始欲望影响下的动物本能”（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3）。

面对两难的伦理困境，男性丧子者的伦理选择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主动性，其内在运作逻辑就是斯芬克斯因子力量的较量。子女死亡后，丧子者面临家庭结构的改变，面对无法起死回生的子女，进行补偿性生育是可行办法。然而，大多数女性丧子者已经过了生育期，在婚姻内部寻求补偿性生育行不通。此时男性丧子者只能分居或离婚，努力重新寻找在生育期的配偶重新生育子女，这种选择主要遵从血脉传承伦理，属于人的动物本能，是兽性的具体表征。在伦理选择过程中，丧子者斯芬克斯因子内部力量的对比演进大致包括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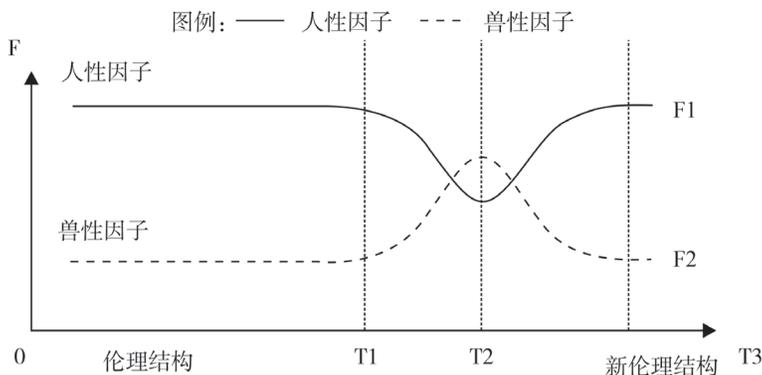


图1 丧子者的斯芬克斯因子内部力量对比演进图

第一阶段：0-T1代表丧子前的伦理教诲阶段，人性因子能够抑制兽性因子。因为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语境中，行动者伦理意识形成，社会伦理身份确立，这时候各自的行为规范、人物关系是确定且稳定的，夫妻都应该做到爱情专一、感情忠诚、忠于对方，形塑造了一种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家庭伦理结构。在这种伦理环境中，人性因子在强度上远远超过兽性因子，当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时，当事者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此时其伦理结构保持稳定。

第二阶段：T1-T2代表丧子后的哀伤阶段，这时候人性因子逐渐降低，兽性因子逐渐上升，进入伦理结构震荡期。在这个阶段子女刚刚死亡，丧子者（尤其是男性）的人性因子强度开始下降，兽性因子强度增强，并反超人性因子，最终形成兽性因子占主导，控制或抑制人性因子。子女死亡后，面对已经过了生育周期的妻子，加上双方可能因为患有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丧子者的

思想和行为偏向极端。如果此时出现补偿生育的可能，这会给丧子者带来极高的替代性选择比较水平（ CL_{alt} ）。这种能够生育子女、延续血脉的预期，恰似《麦克白》中的女巫预言会诱发麦克白身上的兽性因子，并使其不受人性因子的约束，丧子者抛家弃子重新组建家庭的兽性因子被诱发出来，其强度（图1或图2中T1到T2阶段的F2所示）逐渐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丧子者对人类伦理的放弃和对动物伦理的接受。选择离婚或者分居以谋求补偿性生育，必然意味着对婚姻的反叛。对女性丧子者而言，她既要遭受丧子打击，又要遭到婚姻背叛。这也说明男性丧子者的人性因子强度降低（图1或图2中T1到T2阶段的F1所示）；对此大部分女性丧子者多睁一眼闭一眼，予以无奈的默认。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显然是对现代婚姻制度的挑战和颠覆。然而女性丧子者非但没有进行权利维护，反而帮助男性丧子者抚育非婚生子女，这反向说明为了延续子嗣，男性丧子者的兽性因子（F2）逐渐升高，即便如此体贴的发妻也要选择背叛，人性因子强度（F1）的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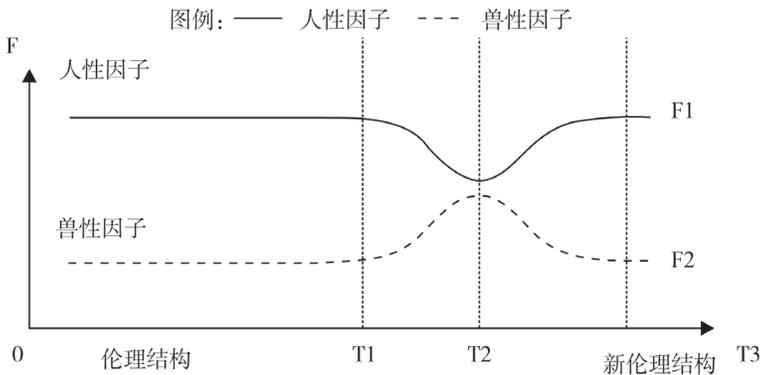


图2 丧子者的斯芬克斯因子内部力量对比演进图

第三个阶段：T2-T3代表丧子后的伦理选择阶段。首先，人性因子强度降低，兽性因子强度升高，到一定的时间，兽性因子会超过人性因子，即T2时间点上出现 $F1 < F2$ （详见图2）。这种情况下，人性因子难以再借助理性意志指导、约束和控制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这时如果出现比较高的替代选择比较水平（ CL_{alt} ），那离婚和分居几乎是必然选择。其次，虽然人性因子强度降低，兽性因子强度升高，但从强度上来看，人性因子强度会超过兽性因子，即T2时间点上出现 $F1 > F2$ 。这种情况下人性因子是主导因子，让人弃恶从善，避免兽性因子违背伦理，男性丧子者虽然有所动摇，但是最后时刻夫妻关系伦理战胜了血脉祭祀伦理，夫妻关系保持稳定。最后，经过人性因子强度的升高和兽性因子强度的降低，二者强度相差无几，即T2时间点上出现 $F1 = F2$ 。此时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会相对平衡，达到伦理意识和伦理规范的动态稳定，即所谓的“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吴笛 21）。此时伦理选择取决于替代选

择水平 (CL_{alt}) 的强度高: 如另择配偶补偿生育的可行性非常大, 男性丧子者也会发生动摇; 如可行性一般或代价极大, 男性丧子者会因年龄身体等原因而维持现状。

在丧子情节中, 从丧子前的伦理教诲阶段, 到丧子后的哀伤阶段, 再到丧子后的伦理选择阶段, 丧子者经历的不同阶段均包含潜在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冲突, 蕴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彼此冲突和相互平衡。惟有人性因子超过兽性因子, 达到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 丧子夫妻才能在伦理困境中彼此扶持, 做出符合伦理身份、普遍道德和伦理诉求的伦理选择。

四、丧子之变与伦理身份的自我重构

在文本叙事中, 丧子情节对丧子者伦理身份的影响是持续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丧子者为人父母的身份, 也影响他们之间夫妻身份的延续。无论丧子者的伦理选择怎样, 他们都会在伦理困境的基础上重塑新的伦理结构, 在自我重构中获得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身份。

首先, 丧子者的伦理结构发生巨大的重组。当人性因子超过兽性因子时, 夫妻关系伦理战胜了血脉祭祀伦理。在这种状态中, 虽然在孩子死亡后丧子者仍坚持对婚姻的忠诚, 夫妻关系保持稳定状态, 但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和支柱的孩子去世, 对丧子者的个人价值观、生活结构、婚姻功能和夫妻沟通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¹ 子女既是夫妻关系的安全阀, 也是摧毁家庭的爆发点。由于经历了子女从有到无的过程, 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相对被剥夺感, 轻则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 重则影响家庭稳定, 使家庭从有核心变成无核心、从稳定状态变成松散状态。甚至子女死亡后, 一些丧子父母的夫妻关系出现形式化、空心化和躯壳化的趋势——虽有夫妻之名, 但无夫妻之实, 伦理结构被强力颠覆或重构。其次, 丧子者的伦理语境发生剧烈的变化。对核心家庭而言, 通常的伦理语境是一般围绕子女展开, 话题一般落脚在子女的成长成才、娶妻生子。然而, 丧子事件颠覆了这种伦理语境, 丧子者的意识、思考和观念都发生变化。就意识而言, 他们会更多地思考的生存问题, 而不是发展问题, 且这种思考往往缺乏逻辑性, 导致双方沟通中断。有丧子者夫妻双方虽然保持表面上的夫妻关系, 但是夫妻之间交流的中断, 感觉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²; 有丧子者相互压抑, 如履薄冰, 彼此隔膜。就观念而言, 从家族血脉的延续者到浑浑噩噩的丧子者, 相应的对当前权力和义务、未来声望和地位关注程度急剧降低, 这是子女死亡后丧子者的一个重要观念转变。最后, 伦理语境变化助推丧子者伦理身份重塑。当人性因子强度降低, 兽性因子超过人性因子或与人性因子相差无几时, 男性丧子者将会选择和前妻离婚或者分

1 See L.E. Oliver, "Effects of a Child's Death o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 Review." *Omega* 3 (1999): 197-227.

2 See R. Schwab, "Effects of a Child's Death on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A Preliminary Study." *Death Studies* 2 (1992): 141-54.

居，重新选择年轻配偶、组建家庭。新的婚姻关系形成后，男性丧子者进入新伦理结构，拥有新伦理身份，进而从责任、义务、道德等方面确认新的伦理身份。心爱的女儿莉迪亚死后，詹姆斯在痛苦和烦恼中背叛了自己的妻子，转而投向黑头发、温顺乖巧的华裔女孩路易莎的怀抱。¹当新伦理身份得到确认并认同之后，男性丧子者想要继续这段婚姻关系，他的兽性因子强度开始下降（即 T2 到 T3 时间段内 F2 的下降），人性因子强度开始上升（即 T2 到 T3 时间段内 F1 的上升），当人性因子超过兽性因子时，丧子者会做出符合道德规范和伦理秩序的行为，这时就会进入新的婚姻稳定期。

在诗剧《浮士德》中，中世纪后期德国小镇平民女孩玛甘泪与浮士德偷吃禁果，未婚先孕，违背宗教伦理和世俗道德，备受世人指责。迫于各种压力，玛甘泪淹死婴儿，主动选择坐牢赎罪。失去婴儿，不仅意味浮士德与玛甘泪失去父母的伦理身份，也预示浮士德开始认真思考爱情婚姻和家国责任。在这一伦理身份转换过程中，浮士德重新思考爱情价值、道德准则和伦理身份等问题，实现了从人生“小宇宙”到世界“大宇宙”的转换。²由此，浮士德与玛甘泪失去婴儿，本质上可视为一个兼具文学叙事和思想价值、道德训诫和信仰分野的伦理事件。经历政治事业的失败后，浮士德在血脉祭祀和夫妻关系的张力结构中选择了后者。他游历古希腊神话世界，不可救药地爱上古希腊美女海伦，并与之生下孩子欧福里翁；后来，欧福里翁不幸坠崖死去后，浮士德与海伦为之陷入沉重的忧愁和思念之中。忧伤过度的海伦不禁感叹，幸福与美好无法持久两全，联系二人爱的纽带断掉了，生命的纽带亦随之断掉。在伦理身份上，欧福里翁之死意味着浮士德与海伦之间的伦理纽带猝然断裂。二人失去为人父母的伦理身份，回归最初夫妻的伦理身份，但彼此之间的伦理情感与自我认知发生巨大变化，而海伦的逝去则进一步消解了二人的夫妻伦理身份。在伦理结构上，欧福里翁坠崖而亡使以子女为纽带的家庭伦理结构悄然消逝，海伦叹谓离去则使以婚姻为基础的夫妻伦理关系彻底崩塌。面临丧子之变和爱妻离去带来的精神创伤，浮士德并未沉沦于伦理困境不可自拔，而是以填海造田、改造荒山、创建理性王国的事业追求，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伦理身份的确立中，重塑了一个追求理性、启蒙民众、介入社会的理想自我。

总之，伴随伦理结构的重组和伦理语境的变化，丧子者会对自我身份有新的伦理认知和自我定位，在婚姻家庭、社会法律和道德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重塑自我的伦理身份和伦理观念，进而消解丧子之变带来的难以言说的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而言，丧子情节不仅是一个有力推动故事发展、

1 参见 伍绮诗：《无声告白》，孙璐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202。

2 参见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28-133。

形成矛盾冲突的叙事情节，更是一个蕴含人物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的伦理事件。丧子事件作为典型伦理问题，不仅使丧子父母长期陷入无法逃离的伦理环境，而且使其面临夫妻关系和血脉传承伦理等无法跨越的伦理困境。在丧子之思的伦理焦虑中，夫妻双方的伦理选择蕴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彼此冲突的斯芬克斯因子。丧子夫妻之间聚合离散等多种形式的伦理选择，改变并重塑夫妻双方的伦理身份。在文化和时代的伦理环境背景下，面对子女死亡的巨大变故，丧子父母常常面临选择夫妻关系伦理还是血脉继嗣伦理的两难境地，往往会建构出新的伦理结构并面临新的伦理困惑。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传统文化与婚姻价值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做出理性的伦理选择并适应新的伦理结构，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因此，既要平衡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的内在关系，又要在传统文化和婚姻价值观中找到平衡点。克制兽性因子带来的违背道德的消极作用，发挥人性因子的符合道德的积极作用，可以使丧子者在伦理选择时能以坚定的道德准则为指引，从伦理困境中寻求出口；同时，民族文化伦理中的生育观念和思想，婚姻家庭伦理中的责任性和义务性，都是丧子者伦理选择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文学文本中的丧子情节作为伦理事件，映照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问题，兼具文本叙事、伦理探讨和思想分析等多重功能。

Works Cited

- 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Fei Xiaotong. *The Fertility Syste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7.]
-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2.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吴笛：“追寻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外国文学研究》4（2014）：19-23。
 [Wu Di. "Pursuing the Ideal Balance of Sphinx Factor: On Nie Zhenzhao's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4): 19-23.]
- 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
 [Yu Hua. *Alive*.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13.]